中国乡城人口流动与城镇出生人口性别比
——基于“五普”数据的分析

伍海霞[1], 李树茁[2], 杨绪松[1]
(1.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2. 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 本文利用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1‰抽样数据, 以城镇区域人口为重点, 定量分析了农村人口流动对城镇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 以及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子女性别的影响。研究发现, 中国农村未流动人口、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和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均偏离了出生性别比的正常水平, 农村人口流动影响了城镇地区生育性别, 农村流入城镇人口相对较强的男孩偏好观念加剧了城镇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

关键词: 出生性别比; 流动人口; 城镇; 农村
中图分类号: C9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4149 (2005) 06- 0011- 08

Rural_Urban Migration and Sex Ratio at Birth in Urban regions of China: Analysis based on 5th Census

WU Hai_xia[1], LI Shu_zhuo[2], YANG Xu_song[1]
(1.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2.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Xi'an, Shanxi 710049)

Abstract: Based on the sample data from the 5th censns of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rural_urban migration on the sex ratio at birth in urban regions, and the sex ratio of rural_urban migrants' children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s that the sex ratio at birth of the rural_urban migrants appears to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ormal, and so do the sex ratio of the non_migrants in rural or urban areas. Rural_urban migration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sex ratio at birth in urban regions. To some extent, strong son preference among the rural_urban migrants has exacerbated high sex ratio at birth in urban regions.

Keywords: sex ratio at birth; migrant; urban; rural

一、研究背景

1980 年代以来,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最近三次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出生性别比已由 1982 年的 108.5, 上升到 1990 年的 111.3, 进而升至 2000 年的 119.9, 远高于国际公认的正常值 103~ 107。在城乡分布上, 农村的出生性别比一直高于城镇, 但近年来城镇地区出生性别

收稿日期: 2005- 05- 08
基金项目: 本文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号 04BRK001)
作者简介: 伍海霞 (1972-), 女, 宁夏永宁人,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性别偏好和公共政策研究。

比也不断上升，1982 年城镇出生性别比为 107. 1，尚接近正常范围，而 1990 年升高到 109. 9，并继续升至 2000 年的 115. 4。城市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过程和机制是目前急需研究的问题。

在城镇人口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同时，随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接纳了众多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中，1985 至 1990 年间全国农村向城镇的总迁移流量达 2 167万人，净迁移流量达 1 961 万人[1]；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总流动量达 14 439 万人，其中流入城镇 11 344 万人。同时，研究发现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地区，也是流动人口较多的地区[2]。

众多的研究已经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孩偏好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异常的根本原因[3]。具有较强男孩偏好意识的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后，生育观念与行为会发生转变，并对城镇地区出生性别比产生影响[4~6]。而到目前为止，大量研究集中分析了生理、生育个体的社会人口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7~8]，针对人口流动对城镇出生性别比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9]。因此，需要在农村流动人口规模逐年扩大的情况下，深入研究农村人口流动对城镇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本文利用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1‰抽样数据，考察城镇与农村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差异，探讨农村人口流动对城镇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以及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子女性别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设计

已有研究表明，在中国整个少数民族的出生性别比远低于汉族；生育妇女的受教育程度与出生性别比成正相关，除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妇女外，小学、初中等其他文化程度妇女所生婴儿的性别比均普遍偏高[10]；已有子女的数量和性别分布会影响随后出生的婴儿性别，孩次越高出生性别比越高[11]。同时，一些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不同[12]。本文认为，农村人口流动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可以从是否流动和流动时间两个方面进行描述。

农村人口向城镇区域的流动，带来了城乡生育文化的交织，引起了城乡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形成了农村未流动人口、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和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在农村地区，社会经济条件相对落后，传统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养老保障的现实需求促使未流动人口保持较强的男孩偏好观念，生育男孩依然是绝大多数农民的心理需求[13]。相应地，农村未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而在城镇地区，随农村人口的流入，生育文化会发生变化[14]。对于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而言，经济收入与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未因农村人口的流动而发生变化，较弱的男孩偏好形成了相对较低的出生性别比[15]；而处于弱势的农村流入人口，随流动时间的延续，在逐步与城镇社会融合的过程中，生育观念与行为会发生转变，出生性别比有望降低[16]。

从流动时间角度，依据文化适应理论，流动后生活环境的变化会促使个体采取同化的形式[17]，调整自身的生活习惯与行为，逐步接受城镇社会的主流文化。一般而言，在城镇滞留时间越长，个体对城镇主流文化适应程度越高[18]，越易于与城镇社会融合，在城镇人口男孩偏好观念弱于农村人口的情况下，流入人口的男孩偏好观念会日渐弱化[19]。因此，在短期内，流动个体与城镇社会融合程度相对较低，生育观念与行为更接近于乡村未流动人口，男孩偏好观念较强，流动群体出生性别比越接近于农村未流动人口；长期内，个体适应了城镇社会生活，男孩偏好观念趋同于城镇当地居民，流动群体出生性别比相对较低，且流入城镇后滞留时间越长的群体，出生性别比越接近于城镇非农村流入群体。

综上所述，本文预期，人口流动影响个体的生育性别，与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相比，农村流入城镇人口更易生育男孩。整体上，农村流入城镇人口与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出生性别比具有显著差异，而与农村未流动人口无明显差异；随流入城镇时间的延长，流动群体的出生性别比逐步下降，短期流动群体出生性别比更接近于农村非流动人口，长期流动群体出生性别比逐步趋近于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流入城镇人口出生性别比随流动时间的变化关系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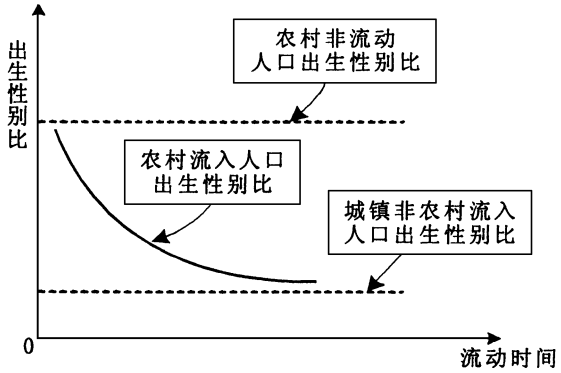

图 1　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与流动时间关系图

三、数据与方法

本文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1‰的抽样数据，选取普查记录的生育婴儿家庭数据进行母婴匹配和数据质量评估。之后，界定流动人口和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将城镇与农村地区人口划分为农村非流动人口、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三个群体，作为后续出生性别比研究的数据基础。

1. 数据母婴匹配

在对普查抽样数据进行重复记录检测的基础上，依据图 2 所示流程对 1999 年 11 月 1 日至 2000 年 10 月 31 日出生婴儿家庭数据进行母婴匹配。依据本文设计的匹配方法，普查记录共生育婴儿 12934 人，匹配后为 10911 人，其中男婴 5942 人，女婴 4969 人，总匹配率为 84.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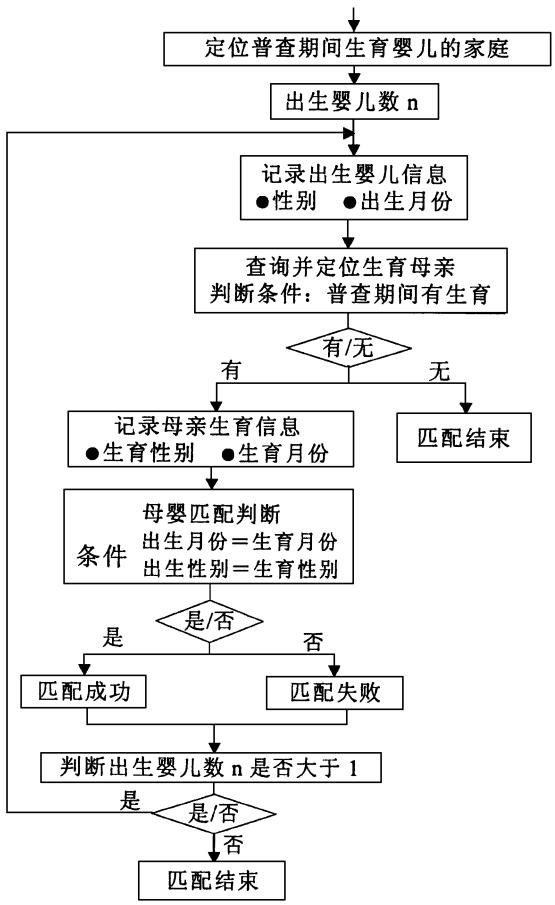

图 2　数据母婴匹配流程

2. 数据质量评估

在研究中，1‰抽样数据与 100% 数据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及偏差，以及经过母婴匹配后形成的性别差异，均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为此，需要对抽样数据本身，以及母婴匹配前后出生婴儿数据进行质量评估。

(1) 1‰抽样数据质量评估

分别计算第五次人口普查 1‰抽样数据与 100% 数据中男婴和女婴的相对百分比，进行“五普”1‰抽样数据质量评估，评价结果见表 1。

表 1 中，总体上，1‰抽样数据与 100% 数据相比，男婴与女婴的相对百分比分别为 109. 6% 和 109. 2%，均大于 100%，说明 1‰抽样数据相对多于 100% 数据，但男婴和女婴的相对比率无明显差异；从城镇与农村的分布来看，1‰抽样数据中男婴和女婴数也相对高于 100% 数据，且

抽样后，男婴在城镇的样本略高于农村样本，女婴在城镇与农村样本分布无大的差异。

表 1 “五普”1‰数据与 100% 数据出生婴儿数比较

项目	男（100%）	女（100%）	男（1‰）	女（1‰）	男（%）	女（%）
总体	644609	537529	7066	5868	109.6	109.2
城镇	207977	178655	2335	1938	112.3	108.5
农村	436632	358874	4731	3930	108.4	109.5

数据来源：《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下册）；2000 年人口普查 1‰抽样数据。

注：男（%）为 1‰抽样数据中男婴与 100% 中数据男婴的相对百分比；女（%）为 1‰抽样数据中的女婴与 100% 数据中女婴的相对百分比。

(2) 1‰抽样数据母婴匹配后的质量评估

以 1‰数据为依据，进行母婴匹配前后出生婴儿数据比较，分析母婴匹配前后数据所体现出的性别差异，结果见表 2。

表 2 “五普”1‰数据母婴匹配前后出生婴儿数据比较

项目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率（%）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体	7066	5868	5942	4969	84.09	84.68
城镇	2335	1938	1996	1664	85.48	85.86
农村	4731	3930	3946	3305	83.41	84.10

数据来源：2000 年人口普查 1‰抽样数据。

在表 2 中，母婴匹配前 1‰数据中共有男婴 7066 人，匹配后为 5942 人，匹配率为 84.09%；女婴 5868 人，匹配后为 4969 人，匹配率为 84.68%，可见匹配后男婴和女婴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从城镇与农村分布上，男婴和女婴匹配率均在 84% 左右，也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即母婴匹配前后，男婴和女婴在数量上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

总之，通过对“五普”1‰抽样数据与 100% 数据的比较，以及 1‰抽样数据母婴匹配前后的比较，男婴和女婴之间均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表明 1‰抽样数据经过母婴匹配后可用于本文的后续研究。

3. 流动人口的界定及相应数据处理

一般意义上，流动人口指现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不一致的人口，而不论其在现住地已经居住了多长时间。在本文中，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将满足以下条件的个体界定为流动人口：户口登记状况选择“居住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者、“在本乡镇街道居住不满半年，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者，以及“居住本乡镇街道，户口待定”者，即离开户籍地半年以上或已经在现住地连续居住半年以上的人户分离人口；将现居住在城镇，迁出地为乡、镇的村委会的人口定义为农村流入城镇人口。从而将城镇与农村普查期间生育人口划分为农村非流动人口、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和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其中，农村非流动人口生育 7251 人，农村流入城镇人口生育 681 人，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生育 2979 人。

4. 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设计，本文对乡城人口流动与城镇出生性别比的分析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首先利用普查期间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和农村非流动人口生育数据，计算相应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以 105 为出生性别比的正常水平，借助于卡方（x^2）检验，判定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和农村非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偏离正常水平的显著程度。并采用似然比（Likelihood Ratio）检验，确定这 3 个不同人口群体的出生性别比是否具有明显差异。其次，利用农村流入城镇人口生育数据，计算不同流动时间群体的出生性别比，

采用卡方检验，判定不同流动时间群体的出生性别比偏离正常水平的程度，借助于似然比检验，确定流动时间不同的群体出生性别比之间是否存在明显差异。

第二部分利用普查期间城镇地区总人口生育数据和农村流入城镇人口生育数据，运用二分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人口流动因素对城镇地区总人口和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子女性别的影响。本文共设计了 3 个模型。其中，模型 1 和模型 2 利用城镇总人口生育数据分析人口流动对城镇总人口子女性别的影响：模型 1 分析人口是否流动对子女性别的影响；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将流动因素扩展为流动时间，考察流动时间对子女性别的影响，以确定子女性别与流动时间的变化关系。对于流动因素对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子女性别的影响，则利用模型 3 从流动时间角度进行分析。在以上 3 个模型中，因变量均为出生人口性别，以女婴为基准类型；自变量则有所不同，其中：模型 1 自变量为是否流动，不流动为基准类型；模型 2 中流动时间为自变量，分为 0 年(代表没有流动)、0 到 1 年、1 年到 2 年、2 年到 3 年和 3 年以上，其中以 0 年为基准变量；模型 3 中，流动时间为自变量，分为 1 年以下、1 年到 2 年、2 年到 3 年和 3 年以上，其中 1 年以下为基准变量。

根据已有的的研究，本文中还包括了母亲个人因素和流入地因素等控制变量，其具体定义和分类如下。母亲个人因素包括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和孩次。其中：年龄，作为分类变量，划分为 25 岁以下、25 至 29 岁和 30 岁及以上三类，以 25 岁以下为基准类型；民族，作为分类变量，划分为汉族和少数民族两类，少数民族为基准类型；受教育程度，分为未上学、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四类，以未上学为基准类型；孩次，作为分类变量，分为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以一孩为基准类型。对于流入地因素，本文划分为东、中、西部三类，以东部为基准类型。

四、分析结果

1. 单变量分析

(1) 城乡区域人口出生性别比分析

表 3 是农村非流动人口、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和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出生性别比。结果显示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出生性别比最低，而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出生性别比最高，且以上三类人群出生性别比均显著偏离出生性别比的正常水平。同时，似然比检验结果表明，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出生性别比与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具有一定差异，而与农村非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无明显不同；农村非流动人口与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出生性别比也不存在差异。

表 3　城乡流动与非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

项目	生育数	出生性别比	卡方检验	*LR* 检验
①农村流入城镇人口	681	134.83	20.459***	①②: 2.808+；①③: 2.040
②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	2979	116.81	8.385**	②③: 0.411
③农村非流动人口	7251	120.13	32.594***	①②③: 2.809

数据来源：同表 2。

注：*** $P<0.001$，** $P<0.01$，* $P<0.05$，+ $P<0.1$

(2) 流动时间不同的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出生性别比分析

表 4 是流动时间不同的流入城镇农业人口出生性别比。结果表明，流动时间在 1 年以上的流入城镇农业人口出生性别比偏离正常水平；流动时间在 1 年以下的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为 120.00，相对较低；当流动时间在 1 年至 3 年时，出生性别比上升至较高水平，而当流动时间在 3 年及以上时，出生性别比又有所下降。但是，似然比检验表明不同流动时间的人群，出生性别比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从总体上，随时间变化，流入城镇农业人口出生性别比并未呈现出明显的线性下降趋势。

表 4　流动时间不同的农村流入城镇人口户出生性别比

流动时间	生育数	出生性别比	卡方值	LR 检验
1 年以下	143	120.00	1.791	①②: 0.538; ①③: 0.623; ①④: 0.167
1 至 2 年	271	139.82	5.332*	②③: 0.038; ②④: 0.071
2 至 3 年	123	146.00	5.499*	③④: 0.074
3 年及以上	144	132.26	4.003*	①②③④: 0.769

数据来源：同表 2。
注：* * * P< 0.001，* * P< 0.01，* P< 0.05，+ P< 0.1

2. Logistic 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村人口流动对城镇区域人口和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子女性别的影响，表 5 给出了 Logistic 模型的回归结果。模型 1 分析了人口是否流动对城镇地区总人口户子女性别的影响，模型 2 分析了流动时间对城镇地区总人口子女性别的影响，模型 3 分析了流动时间对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子女性别的影响。3 个模型的结果简要归纳如下。

表 5　农村人口流动对城镇区域人口户子女性别 Logistic 回归结果

变量	城镇地区总人口		农村流入城镇人口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自变量			
流动因素			
是否流动（未流动）			
流动	1.196*		
流动时间（0 年）			
0~1⁻		1.077	
1~2⁻		1.262+	1.124
2~3⁻		1.287	1.157
3⁺		1.126	1.012
控制变量			
母亲因素			
年龄（25⁻）			
25~29	0.997	0.997	0.944
30⁺	1.034	1.036	1.104
民族（少数民族）			
汉族	1.216	1.213	1.970*
受教育程度（未上学）			
小学	1.704+	1.700+	2.485*
初中	1.769+	1.683+	2.979* *
高中及以上	1.758+	1.753+	3.070*
孩次（一孩）			
二孩	1.383* *	1.384* *	1.105
三孩及以上	2.244* * *	2.248* * *	4.216*
流入地（东部）			
中部	0.990	0.988	1.189
西部	0.822* *	0.821* *	0.892
截距	0.556+	0.559+	0.233* *
-2LL	5003.036* * *	5002.180* * *	907.670+
样本数	3660		681

数据来源：同表 2。
注：* * * P< 0.001，* * P< 0.01，* P< 0.05，+ P< 0.1

首先，农村人口流动对城镇地区家庭子女性别有显著影响。在城镇总人口中，农村流入城镇人口生育男孩的可能性约为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的 1.2 倍，显著高于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表明农村流入人口更容易生育男孩。

其次，流动时间对城镇地区人口子女性别有一定影响。与非农村流入人口相比，流动时间在

1 到 2 年的农村流入人口生育男孩的风险相对较高。但对于农村流入城镇人口群体而言，流动时间并未对家庭子女性别产生显著影响。

再次，母亲的民族、受教育程度和孩次对家庭子女性别也有显著影响。其中，汉族生育男孩的可能性更大；母亲文化程度越高，生育男孩风险越大，这在农村流入城镇人口中表现的更为突出；孩次越高，生育男孩几率越大；在农村流入城镇人口中，三孩及以上生育男婴的可能性比一孩大约高 3. 2 倍。

最后，对于城镇地区整体而言，流入地因素对家庭子女性别有显著影响。其中，东部地区生育男孩可能性是西部的 1. 25 倍，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作用则不显著。

五、讨论与小结

本文利用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1‰抽样数据，从农村人口流动引起生育观念与行为转变出发，在分析比较农村未流动人口、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和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基础上，以城镇地区人口为重点，定量研究了人口流动对城镇地区总人口和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子女性别的影响。本文对中国乡城人口流动与城镇出生性别比的研究有以下几点发现。

首先，中国农村未流动人口、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和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均偏离了出生性别比的正常水平，说明中国城乡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男孩偏好的生育观念与行为；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出生性别比与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具有显著差异，而与农村非流动人口无明显不同，表明了农村流动人口仍然具有强的男孩偏好观念，流入城镇后生育观念向城镇社会转化的程度较低。据 2000 年普查资料，农村流入城镇人口生育婴儿数约占城镇总出生婴儿的 20% 左右，这样农村流动人口的高出生性别比助长了城镇总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偏高。

其次，流动因素对城镇总人口生育性别具有影响。从是否流动角度，农村人口流动对城镇地区生育性别具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而言，农村流入城镇人口更易生育男孩，验证了流动人口对于生育的态度及行为与非流动人口不同[20]，农村流动人口具有更强的男孩偏好观念；流动时间对城镇地区人口子女性别具有一定影响，进一步说明了农村流入人口与城镇非流入人口生育观念不同。但流动时间对农村流入城镇人口生育性别无显著影响，表明流动个体间生育观念并无显著差异，流动后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男孩偏好观念并未随时间的延续而明显弱化[21]。本文认为，由于生活习惯与文化上的差异，农村流入城镇人口不同程度地受到城镇原有人口的排挤与歧视，使流动人口很难融入城镇社会，加之目前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存在大量季节性和回流等现象[22]，并非永久性迁移，受地缘和亲缘的影响，使男孩偏好观念阶段性地在流出地得到强化与恢复，影响了流入城镇人口生育观念向城镇社会转化[23]。另一方面，流动的时间效应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显示。由于本文分析所用的数据中，长期流动人口（流动时间在 5 年以上）只占样本量的 5. 4%，样本相对较少，不同时间段内同期流动人口较少，对于分析结果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再次，已有研究中对家庭子女性别有影响的母亲民族、受教育程度和孩次因素也在本文得到了验证。母亲文化程度越高，生育男孩的可能性越大，验证了生育妇女的受教育程度与出生性别比成正相关的结论。孩次越高，生育男孩的可能性越大。这也说明当前中国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情况下，继续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特别是减少计划外高胎次生育，也是降低城镇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必要而可行的举措。

最后，流入地因素对城镇地区人口家庭子女性别有显著影响，表明不同地理区域内的社会观念、文化习俗、环境与政策等因素，会影响流入人口对城镇生育文化的适应，从而对生育性别产生影响[24]。东部地区对子女性别的影响明显高于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社会经济发展会对人们生育观念产生显著影响。而流入地因素对农村流入城镇人

口子女性别并无显著影响，表明流动人口的男孩偏好观念并未受流入地城镇相对发达的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明显弱化。

总之，本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未流动人口、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和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均偏离了正常水平，说明中国城乡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男孩偏好的生育文化；人口流动影响了城镇地区人口的生育性别，农村流入城镇人口相对较高的出生性别比加剧了城镇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偏高态势。但是，农村人口流动后，在与城镇社会的适应与融合过程中，个体的男孩偏好观念并未明显弱化。文化适应与融合引起的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与行为转变的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流动人口接触城镇社会文化的广度和深度，受流动人口在城镇地区的生活环境、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等的影响更为重要[25]。而在本文中，受人口普查数据的限制，流动后个体的社会交往、社会关系等因素未能得到充分考虑，影响了本研究的深度。为此，需要通过农村流入城镇人口的相关专项调查，确定流动个体社会交往、社会融合等因素，并进一步考察农村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与行为转变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转变对农村流动人口和流出地城镇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查瑞传，曾毅，郭志刚. 中国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上）.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17，192.

[2] 潘兆文. 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分析及其解决办法的探讨.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7，(1)：25－27.

[3] Zeng，Y.，P. Tu，B. Gu，Y. Xu，B. Li，Y. Li. 1993.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 and implications of recent increase in the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 (2)：283－302.

[4] 风笑天，张青松. 二十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变迁研究. 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9)：21－30.

[5] 尤丹珍，郑真真. 农村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分析——安徽、四川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02，(6)：52－62.

[6] Goldstein，S. and A. Goldstein. 1982，Techniques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migration and fertility. *Chapter* 5 *in National migration surveys X*. *Guidelines for Analysis*. p132－162.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United Nations，New York.

[7] 曾毅. 我国近年来出生性别比升高原因及其后果分析. 人口与经济，1993，(1)：3－14.

[8] William H. James. 1987. The human sex ratio. Part 1：Areview of the literattre. *Human Biology*：721－752 Oct.

[9] 郭志刚. 北京市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别比及外来人口影响. 中国人口科学，2003，(6)：53－57.

[10] 涂平. 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问题探讨. 人口研究，1993，(1)：6－13.

[11] 同 [7].

[12] 同 [6] .

[13] 穆光宗，陈俊杰. 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层次结构. 人口研究，1996，(3)：25－33.

[14] Redfield，Robert，Ralph Linton and Melville，J. Herskovits 1936 Memorandum for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38 (1)：149－152.

[15] 同 [4].

[16] Kim，Yun Young. 1985. Communication and Accultura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 Reader*. Eds. L. A. Samovar and R. E. Porter. Belmont：Wadsworth Publishing：379－387.

[17] Garcia，M.，Lega，L. I. 1979. Development a Cuban ethnic identity questionnaire.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 1：247－261.

[18] Yu，Ping；Berryman，Doris L. Berryman. 1996.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elf-esteem，acculturation，and recreation participation of recently arrived Chinese immigrant adolescents，*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28 (4)：251－273.

[19] Yinger，Milton，J. 1985. Ethnic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1：151－180.

[20] 同 [6].

[21] Berry，J. W. 1980. Acculturation as varieties of adaptation. In A. M. Padilla (Ed)，Acculturation：Theory，model，and some new findings，9－25. Boulder，CO：Westview.

[22] Bartel，Ann P. 1989. Where do the new U. S. immigrants live?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7：371－391 October.

[23] 欧阳雪梅，谢海荣. 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问题初探.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2)：57－63.

[24] Sam，D. L.，Berry，W. J. 1995. Acculturative stress among immigrants in Norway.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36：10－24.

[25] Griflith，James and Sandra Villavicencio. 1985. Relationships among acculturation，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 and social supports in Mexican American Adults.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7：75－92.

[责任编辑　崔凤垣]